

宋代文人意趣兴起的成因

苏梅 刘赦

摘要: 受到文治制度的影响,庞大的宋代文人阶层迅速形成,文人士大夫成为时代的精神领袖,拥有话语权。宋代文人意趣的兴起促进了审美观念的转变,而文人群体对文化地位的自觉认知,宽裕的闲适生活提供了赏玩的条件,文人交游面的扩展和多元文化的吸纳等因素是宋代文人意趣兴起的主要成因。

关键词: 文人群体; 自觉认知; 生活环境; 交友圈; 多元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12)04-0075-06

宋代承唐之后,宋人审美观念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如果说唐代之美在声容,繁丽丰腴,宋代之美则在意态,精细澄澈。此特点在宋人之理学、古文、诗词、书法、绘画,乃至工艺方面如印书、瓷器、文房器具、陈设摆件等皆可证验。生活于这一时代画廊的宋代文人士大夫们,其角色意识、文化品格与审美思想也不能不受其浸润,都有了诸多方面的变化。

宋代文人士大夫多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士人形象,即胸有大志而常不得志;博学多才而不能为世用。正如蒋孔阳在《中国艺术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一文中曾指出:“中国封建宗法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一般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当他达的时候,讲究礼乐教化,要当忠臣,‘致君尧舜上’。当他穷的时候,他就混迹江湖,过着隐逸自适的生活,与渔樵为伍,崇奉老庄。这时候他要自由和自然。各门艺术不再是经国之大业,而只是他个人消闲遣兴的玩艺,闲情诗、山水诗是这样,山水画亦

是这样。”^①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宋代文人地位和待遇的提高,与唐代相比,在主客观条件都已具备的情况下,宋代文人喜书作画、鉴古赏玩的生活理想才真正得到实现。正如崇儒而遁道悦禅一样,是对世俗人生的一种逃避和抗争,也是一种自慰和解脱。宋代朱熹在《论语集注》中,也认为孔子的“游于艺”就是“玩物适情”,宋代士大夫参与古董的收藏和赏鉴,也同样是出于对艺术的欣赏爱好和一种生活情趣的追求。

一、文人群体对文化地位的自觉认知

士大夫阶层的兴盛,源于宋代宽宏的文化政策以及对士人尊重与宽容的态度。此外,宋人对文化需求的主观意识与群体性的自觉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宋代士大夫阶层所具有的社会地位和境遇,是促使宋代士大夫群体自觉的重要条件之一。主体意识的觉醒与主体地位的取得,这两方面的实现有其社会的背景和条件。

纵观中国文化史,文人自觉有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从战国百家争鸣后期,开始了士人的初步自觉,到魏晋时期士人个体的自觉,到两宋时期文人士大夫的群体自觉,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徐复观先生在《〈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一文中已指明魏晋时代对美的自觉,和古希腊时代有相似之处,即是由人自身形相之美开始,然后再延展到文学、艺术等方面。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在讨论“汉

收稿日期: 2011-09-01

基金项目: 本文系《宋代文人意趣与工艺美术关系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编号:11YJC760071)阶段性成果;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10SJD760001)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苏梅(1971-),女,江苏淮安人,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博士后,江苏淮阴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设计艺术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设计史论与美术考古、中国画艺术创作与研究。

刘赦(1960-),湖北麻城人,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传统艺术创作研究。

^①蒋孔阳《中国艺术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美学新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42页。

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时，也提到并指出了宋代是继战国时期、东汉末年士阶层的兴起和自觉以来的又一次士的群体自觉之时代。^①宋代社会有外族敌窥，内有朋党之争，引发士大夫阶层的自我反省，并归纳出诸多可以解决当时纷扰不安的人生与事物方面的见解。在人性与思想方面有多元的进展与提升，使得精神生活因环境的需要得到了反思的机会，在自我成长与认同中，得到人性上的解脱，建立了新的人生价值观念。从文化发展现象而言，由文人士大夫为主体创造的宋文化博大而深邃，其消融力与自立性，俨然是中国文化体的象征。对于后世文化艺术的影响至今仍然广大不绝。^②

文治国策确实对宋代文人士大夫群体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是科举制度促使文人群体不断扩大，另一面对士大夫的尊崇提高了士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加上经济状况较为丰裕与生活之悠闲，也有助于士大夫内心的自觉，从而影响到士风与思想观念的转变。但封建专制政治使想有所作为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几乎都饱受宦海沉浮，屡遭贬谪的磨难，心忧天下的责任感作为一种忧患意识，影响着士人的抒情方式和行为方式，导致了士人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和批判，同时，亦具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悲凉之意。驱使士大夫转向内省，至宁静淡泊的诗情画意中寻求精神寄托，在超越功利的审美境界中追求个体生命精神的自足自乐和逍遥旷达。因此对宋代士大夫来说，承担社会责任和追求个性自由不再是相互排斥的两极，宋代士人努力寻找这二者的平衡，由动返静，由外向内，于主体心灵的静观内省中，寻求化解由外在社会政治动荡所造成的痛苦和忧患。特别是在文学艺术方面的追求和研究，以脱离实利的精神表达超世无我的理想，其中不免含有佛老脱俗之趣味。在工艺美术方面，出现了不再专为实用之器物，更有清赏之意趣，成为文人的一种心物寄托，并形成了当时一道亮丽的风景。如北宋文人巨匠欧阳修喜欢收集石刻文字、苏轼爱砚、米芾爱石，揭开起了两宋尚古清玩之风的序幕。正如明代高濂所说：“坐陈钟鼎，几列琴书，拓帖松窗之下，展图兰室之中，帘栊香霭，栏槛花妍，虽咽水餐云，亦足以忘饥永日；冰玉吾斋，

一洗人间氛垢矣，清心乐志、熟过于此。”^③到了宣和年间，徽宗喜爱古器，士大夫也多是家藏古器。而好事者为取悦徽宗，不惜重价搜求，“利之所趋，人竞搜剔山泽，发掘冢墓，无所不至，往往数千载藏，一旦皆见，不可胜数矣。”^④由此可见，宋代文人士大夫和皇家贵族对宋之前的古器物以及当代文房器物、供赏器物的鉴赏之风，是宋之前各个朝代都无法比拟的，由此可言文人意趣到了宋代才真正兴起。

二、宽裕的闲适生活提供了赏玩的条件

宋代文人意趣之兴盛，究其原因，除士大夫自身的审美要求之外，还有其社会诸多方面的原因。如士人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优厚的待遇、闲适的空间以及宋代任官制度的革新、频繁的升迁调贬，都给文人士大夫诸多的机会欣赏到更多的古董奇物。正像王德明先生在其《宋代士人生活情趣特征论》中把宋代士人的生活方式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1、多样性；2、内向性，即宋代士人更倾向于自我性情的觉醒，偏爱室内生活；3、审美性，即在一定程度上，宋代士人的许多生活方式已经超越了功利性的物质享受，进而对生活资料的内在意蕴的欣赏上；4、文化自娱性，即宋代士人的大部分生活方式都是属于对精神文化的创造、欣赏和研究。宋代士人生活方式的这四个特征既是现实重压和士人求得解脱的结果，又是历史发展、传统影响的结果，同时也是宋代文人赏玩之风的必备条件。宋代文人生活方式的变化，带来了诸多的生活意趣，并主要集中于他们的书斋之中，得到了长足的体现，琴棋书画、奇石古器、雅瓷插花等，都成为文人书斋中不可或缺的室中之物。正是因为宋代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这些兴趣爱好、心理趋向，成为时代的风尚，进而形成审美主体的核心，并直接影响着文学艺术和社会思潮的变化。仅从古文诗词及书画艺术来看，宋代文人的审美在意态而不在形貌，贵素雅而不贵华丽。^⑤宋人审美观念的变化，在宋人之理学、古文、诗词、书法、绘画，乃至工艺美术方面如印书、瓷器、文房器具、陈设摆件等，皆可征验。

①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9页。

②黄光男《宋代绘画美学析论》，台北汉光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59-60页。

③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④[宋]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上海书店，1990年版。

⑤霍然《宋代美学思潮序》，长春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北宋时期，宽泛的文化政策以及对士人尊重与宽容的态度，使得宋代士大夫的社会地位很高。宋代文人士大夫的俸禄优厚，赏赐繁多，是前代无法比拟的，各方面政策的倾斜，虽官僚机构的庞杂，人浮于事，但宋代文人士大夫并未沉沦下去，而是在儒、道、释三家思想交互影响之下，文人群体有了自身的审美自觉，文人生活方式较之前代，有了许多改变，生活情趣追求的不同，似乎比唐人多了一份成熟的韵致。在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以及独特心理自觉的支持下，宋代文人士大夫享受着雅致的生活，从事各种文化活动，著书立说，吟诗填词，鉴赏书画古器、墨刻碑帖等等。雅玩品鉴成为宋代文人审美意趣的物化载体和精神寄托。

宋代君主“与士大夫治天下”^①的政策，无疑大大强化了士大夫关注社会、积极入世的外向追求；但统治者为加强君主专制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治制度，官僚机构庞大，职官制度中的官、职、差遣分离，使许多士大夫虽有官位而无职事，士大夫游离政治而寄情于交游、玩物、畅情之中。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皇权进一步强化时期，士大夫生活虽然比较安闲优越，但士大夫与皇权的矛盾和冲突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许多人在仕宦生涯中都几经升降沉浮。宋代的官任制度复杂多变，实行所谓的“磨勘法”，对文武官员三年或五年进行一次考核，然后决定是否升迁。正像宋高宗所说“在官者以三年为一任，一年立威信，二年守规矩，三年则务收人情，以为去计。”^②实际上，一般地方官的任期都比较短，所以士大夫常常奔波在就任与贬免的途中，这些状况就使得宋代士大夫心态特质呈现出其内倾性。他们虽然也充满了“兼济天下”、积极入世的向往，但当面对着宦海风云的变幻莫测，命运的不测，心灵的伤痕难以愈合，他们的注意力则往往更多地转向内心世界，以自我心理的调整去适应外境的变化，为个体精神寻找依托。

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之下，在就任与贬免的途中所要花费的时间往往是比较长，长时间的路途给文人雅玩赏鉴，见到更多的古董器物创造了时空条件。如苏轼多次被调任或贬官放逐，宋神宗时曾受重用，后因新旧党争，屡遭贬抑，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方官，又因作诗“讪

谤朝政”，被人诬陷入狱，出狱后又贬黄州，此后几经起落，再贬惠州、琼州，一直远放到儋州。在这样的境遇下，苏东坡以文人特有的姿态，随缘自适，以读书作画与雅士交游吟诗为自我解脱和慰藉。直到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如此多次调任，不受重用，起起落落，沿途饱览山水烟云，积累下丰厚的创作素材，给苏轼品鉴古器、书画更多开阔眼界的机会和经历。如赴杭州任通判之际，苏轼一路拜访亲人朋友，寻奇探胜，游金山寺、登北固山，游苏州虎丘等。^③到杭州之后，苏轼住凤凰山下，于是便从山上寻取各种石头，垒起来两座假山，并引来山泉，修葺凤味堂，天工人巧，构成了一片宜人风景。^④元祐七年（1092）东坡知扬州仅半年，又得到兵部尚书的任命，路过雍丘（今河南杞县）时，遇到任知县的米芾，两人便一边饮酒，一边吟诗书墨。^⑤……诸如此类的经历，在黄庭坚、米芾等士大夫的生活中也时常发生，正因这些生活经历，为他们的赏鉴和雅玩提供了机遇，不仅可以大开眼界，还可以亲身体验和把玩更多的奇物宝器。

三、文人交游面的扩展和多元文化的吸纳

宋代文人交游面的扩展，对文人意趣的产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唐代文人相比，由真才实学入仕的宋代文人士大夫有了更多的自由空间、社会地位和权力。城市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化交流和教育的普及，也给文人赏玩意趣提供了必要的外在条件。至北宋中期，文人阵营中，以苏轼为重心的三苏，上溯其师欧阳修，下至苏门弟子黄庭坚、张耒、秦观、晁补之等，以及其同时代的亲朋好友和僧道之人，在彼此的交往畅游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文人群体。交游往来之间，赏古鉴物、吟诗作画、说禅论道等点点滴滴，常常在他们的题跋、杂记、书信等文献中有所记载和体现，其间或透露出文人的往来朋友圈，或赞誉士者雅文，更多的是交流他们各自的文艺思想和审美观念。

欧阳修在《集古录目序题记》中记载：“昔在洛阳，与余游者皆一时豪隽之士也，而陈郡谢希深

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70页。

②《文献通考·选举考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

③张晶、颜邦逸《苏轼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47页。

④张晶、颜邦逸《苏轼传》，第49页。

⑤[宋]叶梦得《避暑录话》下卷，《石林避暑录话》，上海书店，1990年版。

善评文章，河南尹师鲁辩论精博。余每有所作，二人者必伸纸疾读，便得余深意；以示他人，亦或时有所称，皆非余所自得者也。宛陵梅圣俞善人君子也，与余共处穷约，每见余小有可喜事，欢然若在诸己。自三君之亡，余老且病矣。此叙之作，既无谢、尹之知音，而集录成书，恨圣俞之不见也，悲夫！嘉祐八年岁在癸卯，七月二十四日书。”^①短短几行文字道出了欧阳修此生的知音与君子之交，赞赏挚友“善评文章”、“辩论精博”，并誉梅圣俞为“善人君子也”。苏轼在《答李昭记书》中写道：“每念处世穷困，所向辄值墙谷，无一遂者，独于文人胜士，多获所欲，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见鄙欲相从口，岂造物者专欲，以此乐见厚也。耶然此数子者，挟其有余之资，而骛于无涯之知，必极其所如往而后已。”（《答李昭记书》）^②在此书信中苏轼非常谦虚地推出他几位好友的胜士才气，并以为之他人的人生财富。又如在黄庭坚《山谷集》中《与荣州薛使君书》有如下记述：“在元祐初，始与秦少游、张文潜论诗，二公初不谓然，久之。东坡先生以为一代之诗当推鲁直，而二公遂舍其旧而图新，方其改辕易辙，如枯 敝轸，虽成声而踈阔跌宕，不满人耳。”^③可见苏轼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在宋代文人往来的书信之中，诸如此类的文艺品评与思想交流不胜枚举。

又黄山谷赞誉：“王晋卿画《水石云林》缥缈风尘之外，他日当不愧小李将军，其作乐府长短句，踈蹕而清丽幽远在江南诸贤季孟之间，近兄其戒坛院佛阁碑，文句与笔画皆顿进，所谓后生可畏者乎”^④。王诜虽然身为皇室贵戚，他在诗、书、画方面都相当有造诣，平素常与米芾、苏轼等谈论诗文及艺流诸术，以此为乐。并且还还把“仕宦居京师十年，不游权贵门”^⑤的人物画家李公麟请到他的府第，描绘他和朋友们集聚游赏的情景《西园雅集图》（如图 1），把友人苏轼、苏辙、黄鲁直、秦观、李公

麟、米芾、蔡肇、李之仪、郑靖老、张耒、王钦臣、刘涇、晁补之以及僧圆通、道士陈碧虚和他自己画在一起，加上侍姬、书童，共 22 人。松林蕉竹，小桥流水，集园林之胜，宾主风雅。米元章的《西园雅集图记》记载了这一盛事：

李伯时效唐小李将军为着色泉石，云物草木花竹皆妙绝动人，而人物秀发，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之气。其着乌帽黄道服捉笔而书者，为东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观者，为王晋卿；……下有大石案，陈设古器瑶琴，芭蕉围绕。坐于石盘旁，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执卷而观书者，为苏子由。团巾茧衣，秉蕉箒而熟视者，为黄鲁直。幅巾野褐，据横卷画归去来者，为李伯时。披巾青服，抚肩而立者，为晁无咎。跪而作石观画者，为张文潜。……幅巾青衣，袖手侧听者，为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为陈碧虚。唐巾深衣，昂首而题石者，为米元章。幅巾袖手而仰观者，为王仲至。……中有袈裟坐蒲团而说无生论者，为圆通大师。……自东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议论，博学辨识，英辞妙墨，好古多闻，雄豪绝俗之资，高僧羽流之杰，卓然高致，名动四夷，后之览者，不独图画之可观，亦足仿佛其人耳！^⑥

林语堂《苏东坡传》中对此盛宴有细腻的文字还原：

米（米芾），苏（苏东坡），李（李公麟），这宋朝三大家常在一处……这一群文人时常在彼此的家中相会，饮酒，进餐，笑谑，作诗，而大部分时间都在陶然佳境中过活……在中国艺术史上有一次大盛集会，十六位学者齐集在王诜驸马的花园中。这就是有名的“西园雅集”，由李龙眠作画留念，米芾题词描写。画里有三大家，苏东坡、米芾、李公麟，还有东坡弟弟苏子由、苏门四学士。石桌陈列于花园中高大的苍松翠竹之下，河岸花竹茂密……苏东坡头戴高帽，身着黄袍，倚桌作书，驸马王诜在附近观看……米芾立着，头仰望，正在附近一块岩石题字。秦观坐在多有节瘤的树根上，正在

①[北宋]欧阳修《集古录目序题记》，《全宋文》卷 719，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曾枣庄、刘琳主编，巴蜀书社，1988 年版。

②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 49，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 1439 页。

③[北宋]黄庭坚《与荣州薛使君书》，《山谷集》卷 19，吉林出版集团，2005 年版。

④[北宋]黄庭坚《跋王晋卿墨迹》，《山谷集》卷二，吉林出版集团，2005 年版。

⑤俞剑华注译《宣和画谱》卷七，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74 页。

⑥米元章《西园雅集图记》，《文章辨体汇选》卷五百八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

听人弹琴……^①

欣赏画作，想见当时盛况，在当时只不过一次平常的朋友聚会，由于宾主的名声都太大，又有高超的画技和书法著此为证，于是成了冠绝千古的风雅之事。画中这些文人雅士风云集会，或挥毫用墨，或吟诗赋词，或抚琴唱和，或打坐问禅。不仅表现出不同阶层人物的共同特点，还画出了尊卑贵贱不同人物的个性和情态。由于苏轼、苏辙、黄鲁直、李公麟、米芾等都是翰苑奇才，后人景仰之余，纷纷摹绘。^②



图 2: 1 宋刘松年《博古图》、2 宋佚名《消暑图》、
3 宋版画《博古图》

图片来源: 1 中国美术图库 2 艺苑掇英、
3 俄国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元祐元年，王安石、司马光相继去世，苏轼成为朝中文才威望最高的人物，黄庭坚、晁补之、张文潜、秦观始游其门，号称“苏门四学士”，苏轼迎来了多次苦难之后其人生最为得意的时期。西园雅集发生于元祐二年（公元 1087 年），东道主驸马都尉王诜，自幼勤读书，嗜书画，好与文人墨客游，苏轼、黄庭坚、米芾乃其挚友，连十年不游权贵门的李公麟也是常客。王诜家筑有“宝绘堂”，藏古今法书名画，精加赏析，博采众长，丰富自己书画技巧。苏轼曾著文记其事，赞叹王诜对艺术孜孜不倦之精神。元祐二年的王诜已经历了公主去世、自己遭贬的磨难，昔日繁华不再，西园的这次宴游，实际上是这些文人的劫后重聚和人生小憩。

北宋时期形成的这股文人品鉴古物之风，还可以从宋人留下来的其它绘画中，找到当年的点点印迹。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宋代画家刘松年的《博古

图》（如图 2-1），此画以山水为背景，在这种葱郁浓密的松林中，几个文人墨客正在把玩古董，所鉴赏的古董有铜鼎、香炉、瓷罐、瓷瓶、执壶等。边上有人正在煮水，有人手中捧着碗盏，估计下个节目是斗茶。俄国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宋代版画《博古图》（如图 2-3），画中一位貌似《听琴图》中的宋徽宗，且头戴东坡帽的文人，正在品鉴古物字画。苏州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宋人《消暑图》（如图 2-2），从图中可以了解士大夫们对古董的认识，几位文人正在鉴赏一幅古画，桌上则排满了钟鼎彝器之类。由士大夫所带动的这股风气带动了皇家、商人的参与，周密的《齐东野语》中记载有宋高宗会定期带领文人士大夫观赏青铜古器等，并组织一批书画家仿制临摹古画，与工匠共同仿制青铜古器。当时更有所谓“好事者”的“附庸风雅”，使古董的价位提高，把古董作为财富来搜刮，这一串连锁反应，从而带动了一支庞大的好古队伍。其中苏易简为最为突出的代表，在《苏氏图画》中有



图 1: 北宋李公麟《西园雅集图》

图片来源: 中国美术图库

载：“苏大参雅好书画，风鉴明达。太平兴国初，江表平，上以金陵六朝旧都，复闻李氏精博好古，艺士云集，首以公倅是邦。因喻旨搜访名贤书画，后果得千馀卷上进。既称旨，乃以百卷赐之。公后入拜翰林承旨，启沃之余，且复语及图画。于时敕借数十品于私第，未几就赐焉。至今苏氏法书名画最为盛矣（公尝奏对于便殿，屡目画屏，其画乃钟隐画《鹰猴图》。上知其意，即时取以赐之，余尝于其孙之纯处见之。）”^③由此段文献可知，苏易简

^①林语堂《苏东坡传》，海南出版社，2001 年版，第 319 页

^②著名画家南宋马远、刘松年、元代的赵孟俯、钱舜举、明代的唐寅、清代的石涛、丁观鹏等，都曾画过《西园雅集图》，“西园雅集图”成为历代人物画家的一个常见画题。

^③郭若虚、邓椿著，米田水译注《图画见闻志·画继》，湖

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利用职务之便，既可博览天下宝物，又有君王的赏赐，为北宋收藏家中首屈一指。其受赏赐的宝物积累甚多，且可慢慢赏玩，并著有《文房四谱》。至于对古董认识品鉴范围的扩大，也与士大夫们有关，宋代有关于金石研究的著书，如北宋赵明诚的《金石录》以及专门研究古器物的《考古图》、《宣和博古图》等，至南宋杜绾的《云林石谱》、赵希鹄的《洞天清录》，从这些著作中可知，宋代文人研究所涉及的古董已具相当范围，除了古翰墨、古画、古钟鼎彝器之外，还有古琴、古砚、怪石、研屏、笔格、水滴、古瓷、古今石刻等，这是宋代文人赏玩意趣之理论的总结和文献资料的佐证。

由以上内容可知宋代文人士大夫在朝政之余，常常交游于朋友之间，或谈诗论画，或作书弹琴，或品茶论道。据笔者粗略统计，在黄庭坚的《山谷集》中，提及苏轼约 458 次、李伯时约 81 次、晁无咎约 45 次、秦少游约 40 次、张耒约 30 次等。（其中可能有与《山谷集·诗注》相重复之处）在东坡所有的著集中，提及黄庭坚约 316 次、晁无咎约 285 次、文同约 275 次、秦观约 101 次、李伯时约 99 次、张耒约 41 次等等。（其中可能有与《苏诗集注》等相重复之处）在文人士大夫频繁的交游与书信往来过程中，随着交流思想观念的加深，逐渐形成了一个交友文化圈，虽然在生活经历或个性上会有所不同，但在思想上一定会有相似的观点与共识。这在西方社会学家尼尔·史美舍（Neil·Smelser）著的《社会学》中也有类似的总结：“文化是社会生活的凝结剂。文化不仅经由社会化传递并与其它文化接触，而且能产生团体的归属感。同一文化团体内的成员，彼此之间比较容易表现在俚语、品尝食物的口味、服装和其它文化特色方面的相似。”^①像苏东坡、黄庭坚、秦观、晁无咎、张耒、文同、米芾

等在宋代朝野都有很大影响力的文人，所形成的戚友文化圈，他们相似的思想观念和审美关照在当时社会，可以说是引领文化风尚的精神领袖。

此外，多元文化的融合，也是催生文人意趣的条件之一。魏晋以后玄学兴起，佛教渐盛，打破了儒学独尊的局面，思想比较自由。唐中后期禅宗兴起，赵宋承继唐朝，虽然提倡儒学，并不排斥佛、道，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局面。太祖笃信佛教、宋太祖与佛修缘的典故，国内大量建造寺院，太宗之修佛译经，悟道禅机，就历史记载的赵宋帝王参禅的就有仁宗、英宗、神宗等诸皇帝，这些都体现了赵宋时期帝王礼佛重佛的情结。徽宗尚道，文人士大夫阶层更是与佛道趋之若鹜，参禅论道成风，直接导致了北宋时期禅道学的发展与居士的兴旺。在很大程度上，禅宗的发展对宋代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浸染中国思想文化很深，宋代文人更多地从老庄思想及魏晋玄学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及“言不尽意”、“得意忘像”中吸取了精华。在地域文化方面，地处丝绸之路要冲地段的西夏文化，以及北方游牧民族的辽金文化，对中原汉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这些多元文化的吸纳、融汇贯通，对文人的审美取向的定位和生活意趣的产生起到直接的催化作用。

结 论

正是内因文人群体对文化地位的自觉认知，外因宽裕的闲适生活提供了赏玩的条件，以及文人交游面的扩展和多元文化的吸纳，才促使文人意趣在宋代真正兴起。文人士大夫在清玩与收藏的同时，与当时的诗词、书画之风的转变相呼应，逐渐形成了尚古、尚意的美学观，并对工艺器物的生产、对新产品以及稀奇物品的挖掘，都起到了引导的作用。

（责任编辑：黄云鹤）

南美术出版社，2000 年版，第 221-222 页。

①尼尔·史美舍（Neil·Smelser）著，陈光中等译《社会学》，桂冠图书公司，1992 年版，第 39 页。